

民族主义、国家想象与现代文学

旷新年

目 录

- 一、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 二、“新中国”想象：文学与政治、个人与国家
- 三、现代革命伦理的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个常识性的说法：“落后就要挨打”。我却认为，其实另一个说法“没有组织就要挨打”比斯大林的这个说法更要具有真理性。组织需要不同的话语装置。民族与阶级是现代两种最重要的话语装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20世纪是共产主义的世纪。20世纪，民族与阶级这两种话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是，“民族”代替了“阶级”。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认为，历史的精神或者人类的意识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所肇始的“20世纪”，到1979年就提前结束了。当然，20世纪的最后终结是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大厦”坍塌成为民族主义的碎片。

1) 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9—170页，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一、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话语装置和最基本的组织形式。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把全球的国家分为三类：一类为失败国家或者说前现代国家，例如索马里和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合法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一类是后现代国家，例如欧洲，已经基本上超越了民族国家，建立了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经济共同体——欧盟；一类是现代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美国和中国，这些国家的运作没有超越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

20世纪初的中国，类似于今天的阿富汗，受到外国帝国主义间接或直接的支配，武装割据，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使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漱溟晚年有一个观点，中国最缺乏的是两个东西：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梁说，从抗战开始，毛泽东一直注重中国的特点，一方面，从农村入手，将散漫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引进现代的科学技术。梁评论毛的思想说，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是一个必要的组织化过程，如果中国想要进步，就必须将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然后才能引用现代科学技术。²⁾梁漱溟的传记作者艾恺认为，毛泽东的最大贡献是使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成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直到1950年代，中国才真正成立了。³⁾日本许多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可以说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当然，西方也有人认为，中国直到现在也仍然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帝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有的传统帝国都解体了，比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甚至俄罗斯这个帝国最终也解体了，只有中华帝国成功地转变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在中国的现代历史舞台上同时并存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共产党的阶级话语这两种不同的话语。1930年代，这两种话语角逐政权。可以说，当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政策都失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无法真正达成民族主义目标，按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里所说的，“国家不像个国家，政府不像个政府”。在《1928：革命文学》一书里，我谓之“国民党统治的失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

2) 梁漱溟《这个世界會好嗎》，第87頁，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

3) 見梁漱溟《这个世界會好嗎》，第268頁，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

民党官方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混乱不堪的官方民族主义文学遭到鲁迅和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遥控下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没能把握住时代的精神。国民党没有成功，沦为新军阀。共产党在城市和农村遭受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毛泽东才获得了机会，才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产生“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西安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的话语发生了重大调整。这种调整的重要关键就是对于“民族”内容的强调。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形式”，提出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中共提出了自己民族的“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失败开始走向胜利，并且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基本的单元是民族国家，这一体系运转的基本规律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的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学本质上是民族国家文学。民族国家成为了中国现代作家一种最基本的想象形式，“我是中国人”成为了一种最重要的共同体经验。可是，“我是中国人”这种观念并不是天然的，而是现代教育的结果。艾愷在《最后的儒家》这本书中说：“当然，中国很早便有学校了，但传统的学校是在家族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新式学校的学生有着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身份——‘中国人’。他们建立的学生组织也在另一种前所未有的运动——群众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⁴⁾“中国人”这种身份意识离不开现代媒介，与小说、报纸以及现代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报纸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创造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发生是外来侵略的结果，是西方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当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表示道歉的时候，毛泽东充满幽默地说，日本军阀过去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就不能团结起来，因此，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应该“感谢”日本军阀。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经常“感谢”自己的敌人。他不仅感谢日本人，而且也感谢蒋介石和美国

4) 艾愷《最后的儒家》，第29页，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人，因为他们使得一盘散沙的中国团结、统一和强大起来。

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运动教父李泽厚把中国现代历史概括为一个著名的说法“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说法在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运动中覆盖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提出的著名的“反帝反封建”论断。老舍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说：“‘五四’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⁵⁾李泽厚把“救亡”和“启蒙”、“反帝”和“反封建”割裂、对立起来和狭窄化了。他把“反帝”盗换成“救亡”，把“启蒙”盗换为“反封建”。一者是民族主义要求，即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一者是个人的主义目标，即个性觉醒和个人解放。实际上，在中国，“启蒙”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个人主义”，都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共谋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最早产生的是“民族”的启蒙，是民族主义目标的提出，是民族主义的倡导，而“个人”的启蒙则是源于“民族”的启蒙，“个人解放”的要求源于“民族解放”的要求。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之父和自由主义先驱梁启超那里，“新中国”和“新民”这两个概念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所谓“个人解放”，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把“个人”从“家族”之中解放出来；并且，最终是为了将“个人”组织到比“家族”更大的现代结构——“国家”之中去。

中国现代展开的主要是一个“破家立国”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叙述的主要是一个“破家立国”的故事。在西方帝国主义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同时，为了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必须依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则首先必须摧毁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家族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从“家族”中解放“个人”和创造现代国民。这样就发生了从“创造国家”到“创造个人”（国民）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国现代的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的推动下发生的。甲午战败和瓜分危机导致了晚清的启蒙运动。1937年，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同时，发生了“新启蒙运动”。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总是和扫盲、识字运动、人身解放、家庭解放、婚姻解放、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等联系在一起，共产党的军队被称为是一支“文化部队”。

5)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文集》第14卷，3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民族是现代世界的主题，民族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⁶⁾在与现代世界接触以后，中国传统的“家族”就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中国的“家族”打不过西方的“民族”，因此压抑了“民族”意识的“家族制度”就成了“万恶之源”。1919年1月，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的傅斯年的《万恶之原》一文中直指家庭是“万恶之原”。⁷⁾中国现代的“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写道：“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⁸⁾因此，需要通过民族主义，唤醒民族意识，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把他们变成国民，组织到现代国家里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民族”打败了中国的“家族”，于是，中国被迫放弃传统的家族主义，转而接受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中国现代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一个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一个是巴金的《家》，都是关于家族主题和指向家族主义的。这两部作品都指控家族“吃人”。正如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控制和壟断了历史一样，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家族话语也壟断了历史，家族压抑了个人的地位。然而，实际上，民族主义导致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它不是产生了比家族主义大得多的罪恶吗？

老舍的《四世同堂》体现了“家”“国”话语的尖锐对立和“家”“国”话语之间的转换。小说一开始描写祁老太爷“家”的观念怎样压抑了“国”的意识。不论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还是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似乎都与祁老太爷无关。他的家里存放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这种传统的生存经验使得祁老太爷对导致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卢沟桥事变这样的国家大事也没有切身的感觉。《四世同堂》的第一部题为《惶惑》，实际上是祁老太爷的惶惑，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祁老太爷的“家”的传统

6) 梁启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飲冰室文集》之十，35頁。

7) 孟真《万恶之原》，《新潮》第1卷第1号(1, 1919)。

8) 孫中山：《三民主義》，見《孫中山選集》，第617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

经验的崩溃。日本侵略者带给了他新的生存经验，“家”被摧毁了，“家”已经失去了保护的功能和能力。于是，“家”的思想不得不让渡于“国”的意识。现代文学对于传统家族制度及其道德进行了猛烈批判，这种批判是为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扫清道路，因为家族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巨大障碍。“家族制度的罪恶”归根到底在于妨碍了现代民族主义的目标。

在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是一个大故事，而其他如个人解放、阶级解放、妇女解放，则是这个大故事里面的许多小故事。不论是个人解放、妇女解放、儿童解放，还是阶级解放，都与民族解放的目标相联系在一起。以妇女解放为例，正如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所指出的：“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⁹⁾ 现代革命反抗各种传统的角色，实际上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角色——现代国民，是为了创造一个现代结构——现代民族国家。

二、“新中国”想象：文学与政治、个人与国家

我们从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的一个情节出发来理解民族主义怎样渗透进现代文学叙事之中。《沉沦》小说主人公临死前的独白，将自己的自杀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小说主人公把自己的死亡归结于国家，他的道理何在？它的想象逻辑是什么？他为什么把自己的自杀归结到国家上面？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这种想象的路线是怎样形成的？在小说里，我们作为读者其实也许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小说的主人公在投海自杀前的联想和一番独白好像是突如其来的。这种联系不是那么充分使人信服的。但是，另一方面，也等于它更强烈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从晚清的“富国强兵”到毛泽东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20世纪中国的一个

9)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10页，王宪明译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年

根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从根本上服务于他“新民”和“新中国”的目标：“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¹⁰⁾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于中国现代文论来说具有奠基的意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然的延续。

民族国家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想象力和想象方式。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对于世界的观念和想象，如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亚洲主义、国际主义、阶级斗争等等，然而，现代世界最根本的是发端于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朱自清在《爱国诗》中指出：“这里国家的观念或者意念是近代的……这个国家是抽象的……这个抽象的国家意念，不必讳言是外来的，有了这种国家意念才有近代的国家。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诗人是时代的先驱，她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她的诗里。”¹¹⁾王一川指出：“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¹²⁾按照严家炎的说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鲁迅的《药》《阿Q正传》等作品正是形象化的‘民国的建国史’”。¹³⁾

曾朴《孽海花》开头的危船的寓言，尤其是，从清末开始，产生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等这一类未来幻想小说。新的时间和空间观念的出现这一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这种想象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现代性叙事的开展。“改变中国”和对于“新中国”的想象成为了中国现代叙事和抒情的重要主题。

何其芳在《解释自己》一诗中充分体现了一个诗人对于民族的历史期待和“文学想象”：

呵，什么时候我才能够

写出一个庞大的诗篇，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叫‘中国’。”

艾青作于抗战时期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以非常鲜明、强烈的意象表达了现代中

10) 飲冰《論小說与群治之關係》，《中國近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11) 朱自清《愛國詩》，《新詩雜話》，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

12) 王一川《中國人想象之中國——20世紀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東方叢刊》1997年第1、2輯，桂林：广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13) 嚴家炎《論魯迅的夏調小說》第3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华民族苦难的经验：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写于抗战时期，写于日军侵略者的监狱里面。它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了对于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沉沦的祖国山川大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穆旦在《赞美》中描述人民怎样“相信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去想象和凝聚一个民族共同体，去体验一种对于共同体的认同，陌生的人群被这个新的“名词”和“想象的共同体”召唤和整合到民族解放的“大故事”之中去：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眼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胡风以对于历史的强烈预感和激情，写下了有名的诗篇《时间开始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变迁中，尤其是通过追踪小说这种虚构叙事由一种边缘文体上升为文学正宗的踪迹，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想象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创造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反过来也可以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某种“想象的”和“建构的”特点。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先驱和民族主义之父，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提倡“新小说”和“政治小说”，把小说与群治、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我们通常只注意从晚清到五四小说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置上的变化，而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地位变化的过程中，小说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新小说”与“政治小说”具有密切联系。通过“新小说”的倡导，长期被排斥在文学正统之外的小说通过与政治结合，成为了一种最中心的现代文体。“新小说”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一种无足轻重的“稗史”和“小道”，相反，它已经转变成为一种宏大叙事，承担起社会重整的功能。现代文学有力地改变了我们的想象力和想象方式，有力地重塑了我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安德森说：“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十八世纪欧洲的印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印象共同体之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印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¹⁴⁾报纸和小说等印刷媒介通过故事与一个广大的范围、与许多陌生的人群发生了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和想象文学的形式和对象不可分离的。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支配着文学的进程，把‘民族性’和‘民族语言’这些浪漫主义的概念引进（主要是幻觉的）文学领域成为明确的‘民族文学’。在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民族印刷媒介’——报纸和小说，

14) 班納迪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与散布》，28頁吳叡人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

文学参与了民族基础的构造。正像弗兰西斯科·德·桑克蒂斯所谓的‘19世纪欧洲的民族性(nationality)崇拜’描述的那样，尤其是小说作为一种复杂然而边界清楚的艺术作品在将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¹⁵⁾“新中国”的政治创造和现代的文学想象、叙事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在民族国家的构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建构都与现代叙事文学密切相关。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茅盾等人反对消遣游戏的文学观念。朱自清指出，消遣游戏的文学观念才是小说真正的传统。五四文学革命改变了这种传统，创造了现代小说的新传统和新形态。朱自清说：“新文学提高了文学的地位……而新文学跟过去的诗和小说不同之处，就是它是认真的负着使命。早期的反封建也罢，后来的反帝国主义也罢，写实的也罢，浪漫的和感伤的也罢，文学作品总是一本正经的地表现着并且批评着生活。这么着文学扬弃了消遣的气氛，回到了严肃——古代贵族的文学如《诗经》，倒本来是严肃的。这负着严肃的使命的文学，自然不再注意‘传奇’，不再注意趣味和快感，读起来了得正襟危坐，跟读经典差不多，不能再那么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¹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小说界革命”与其说小说的“现代化”，不如说小说的政治化。

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是中国文学的光辉传统。铃木修次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中日文学根本的殊异在于“风雅”观的区别，也就是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看法。他指出，中国人认为真正的文学不能与政治无缘，不回避政治问题并且以它为对象的文学，才是“风雅”的文学，好的文学。中国文学中“风雅”的概念及其审美传统体现了中国文学深刻的政治性。毛诗序有关诗的分类以及“风”、“雅”的定义与政之大小直接相关：“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体，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铃木修次诠释说：“换言之，把政治问题放在个人生活的范畴里来加以领会的是‘风’。把人类社会问题同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理解的是‘雅’。”¹⁷⁾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由于与政治的不同关

15) Brennan Timothy *The national longing for form* in 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48.

16) 朱自清《論百讀不厭》，《朱自清全集》卷，2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年

17) 鈴木修次《中國文學与日本文學》，第14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年

系，不同的文类形成了不同的等级关系。

周扬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时指出，文学要写人的命运，但人的“命运”是什么呢？有一次，拿破仑跟歌德谈到悲剧的问题。歌德说，古代“命运”这一概念现在要由“政治”来代替。歌德的意思是说，现代支配人们命运的东西主要就是政治。¹⁸⁾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当梁启超将小说这种从前是消遣游戏的通俗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联系起来，即把它变成同“群治”、“新民”、“新中国”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的“新小说”之后，小说也就从文学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因此，实际上“小说界革命”是小说政治化的过程。晚清到五四，小说地位的改变，正是因为它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小说性质的改变。

在现代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和“个人”这两个故事交织叠合在一起了。“民族”的大故事和“个人”的小故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中国现代的“成长小说”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小说。巴赫金说：“某种建构主人公的原则总与一定的情节类型、对世界的一定的见解，与长篇小说的一定的布局结构相联系。”¹⁹⁾而在“成长小说”中，“内容”和“形式”成为一种完美的结合。在“成长小说”中，在时间的过程，在叙事的推进中，“民族”和“个人”都发生了变化，它们和时间一起成长。巴赫金对“成长小说”有过如下的诠释：“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²⁰⁾他认为“人在历史中成长”这种成分存在于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他在论述现实主义型的成长小说中指出，人的成长不再是他个人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

18) 周扬《解放思想，忠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谈有关当前戏剧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1年第4期。

19)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小说理论》第21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0)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小说理论》第2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型的人。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的成长问题。所以，未来在这里所起的组织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这个未来当然不是私人传记的未来，而是历史的未来。发生变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于是人就不能不跟着一起变化。显然，在这样的成长小说中，会尖锐地提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自由和必然问题，首创精神问题。成长中的人物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²¹⁾《红旗谱》将复仇上升为阶级斗争，上升为历史理性。1950年代《青春之歌》、《红旗谱》和《创业史》等小说经典被称为“成长小说”。这些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和新的民族国家的创造的历史构成了一种完美的、高度统一的叙事。因此，按照巴赫金的理论，《青春之歌》、《红旗谱》和《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经典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成就。与1950年代这些革命“成长小说”相对照的是，1930年代茅盾的《子夜》和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否定性的成长小说”，这些长篇小说描写了国家的政治混乱和黑暗以及主人公“个人奋斗”的失败。它们说明了个人的崛起必然是民族的崛起，并且归根到底是阶级的崛起。1930年代这些否定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的幻灭预示了民族国家叙事必然转向新的形态。

民族国家的共同体经验给个体死亡这个永恒的主题带来了新的表现风格。在古代，对于战争的描写经常带有一种悲凉、虚无的调子；然而，现代文学对于死亡——为国捐躯的表现则迥然不同：

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
——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
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
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
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²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小说由边缘上升为文学正宗，在“小说”变成了“大道”的同时，白话由“俗语”变成了“国语”。安德森说：“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²³⁾吴汝纶在《东游丛录》中

21)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小说理论》第232-23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2) 艾青《吹号者》，《艾青》，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3年。

引用日本伊泽修二的话说“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国语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妨，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亟亟也。”²⁴⁾现代民族国家是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所有的国民在形式上即在形式主义的、法律、政治、经济面前是平等的。而在传统社会里，语言和书写是不平等的，士大夫的书写文字和引车卖浆者流的口头语言是不平等的，所以，创造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首先就要求创造一种全民共喻的民族共同语。它就要打破语言上文言/白话、贵族/平民、上层/下层的等级分隔，就要实现言文合一。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文学革命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的白话文运动就是以欧洲文艺复兴现代国语的创造为历史依据。周锦在《中国新文学简史》中指出：“中国新文学，是要从实质上建设民国，并促成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摒弃了典雅艰深的文语，力求接近大众的口语，俾使广大群众容易接受。国语的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一致的形貌。”²⁵⁾因此，也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因为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是一个以追求同质化为目标的创造运动，所以它成为了一个“国语”和“普通话”压抑“方言”和过程。

三、现代革命伦理的产生

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嘲弄了马克思主义者对20世纪民族主义的压倒性胜利的失望，说送给阶级的信被错误地送到了民族的手中。然而，费约翰指出，中国却似乎是相反的情形：“在中国，邮递员似乎把给阶级和民族的‘觉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个地址。”“在中国，各个革命的社会阶级的联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觉醒’了。”²⁶⁾毛泽东认为，民族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因此，反过来，阶级斗争实际上仍然没有脱离民族国家这个现代故事。毛泽东从“民众的大联合”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终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1926年作为国民党的

23) 班納迪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与散布》，139頁

24) 吳汝綸《東游叢書》，《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25) 周錦《中國新文學簡史》，第4頁，台北：長歌出版社，1979年。

26) 費約翰《喚醒中國》，第455頁，李恭忠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宣传部长而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研究中国的阶级问题是要弄清楚“我们是谁？”这一问题，而最终的目的是要研究依靠什么力量来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著名的学者亨廷顿的一本新书叫做《我们是谁？》。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施密特也同样认为，首先要分清敌我。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得出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泽东是以什么来划分敌我呢？他是以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为分清敌我的界线和试金石：“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谁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谁就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敌人。为什么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相一致的，而与“我们的”（民族、国家）的利益是根本相对立的。后来替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的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当时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中国境内的人民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是不是相互抵触的？中国的民族意识由那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支持？他说，这些问题在目前非解答不可，并且这些问题的解答影响到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政策。陶希圣认为，民族形成的过程是与封建制度的崩坏以及资本主义的发达的过程一致的。在被压迫民族中间，工农阶级是民族意识的支持者，民族意识的表现同时又是阶级意识的表现。只有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参加，才有可能反抗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现代政党，然而，国民党却没有宣称它是一个全民党。陶希圣明确指出，没有超阶级的党。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超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工农商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等被压迫民众的革命党。²⁷⁾

梁漱溟晚年有一个反省：他早年一直否认阶级，想使中国合起来，可是却没有使中国合起来。相反，毛泽东主张阶级斗争，通过分而走向了合，通过阶级斗争使中国团结统

27)陶希圣《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84、100、45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一了起来。毛泽东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的利益才是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中国只有在工人农民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团结、统一和巩固。1930年代左翼文学一个崭新的内容就是阶级意识的诞生。殷夫的诗歌、叶紫的小说和洪深的戏剧都表达了阶级意识的形成。殷夫的“红色抒情诗”最典型和形象地表现了阶级意识的发生。殷夫在《别了，哥哥》中写道：“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²⁸⁾他在《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中说：“我自己已被我所隶属的集团决定了我的前途，这前途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们整个阶级的”。²⁹⁾殷夫的“红色抒情诗”否定了传统的家族伦理而建立了现代的革命伦理以及新的阶级认同。因此，“我已不是我”（《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已经凝成了“我们”——阶级（《我们的诗》，载1931年1月《拓荒者》创刊号）。

文化大革命把从晚清开始的现代“破家立国”推向了一个极端。《红灯记》中的“革命家庭”，通过“阶级”重构社会和国家，它彻底超越了传统的“血缘伦理”，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现代“革命伦理”。《红灯记》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家国想象和阶级情谊：“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我姓李，你姓陈，你爹他姓张。”样板戏通过革命叙事建构了一种现代“革命伦理”、“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都说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体现了对于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也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建立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

1950年代的革命通俗小说《林海雪原》这样解释主人公杨子荣的成长和智慧：“杨子荣同志之所以有这样的大智大勇，我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在入党宣誓的前夜曾这样说：‘天下的地主是一个妈，天下的穷人是一家，我老杨这条枪和我的这条命，一定跟着党打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来！要把阶级剥削的根子挖净，使它永不发芽，要把阶级压迫的种籽灭绝，使它断子绝孙。’”阶级斗争的观念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凝聚了新的阶级力量和阶级智慧。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杨子荣诞生和成长的过程，以至他的智慧的产生，都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这一想象形式有关的。杨子荣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他所代表的的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他的形象是一个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标志。

28) 《别了，哥哥》，《拓荒者》4、5期合刊（1930年5月）

29) 《写给一个哥哥回信》，《拓荒者》1卷3期（1930年3月）

辛亥革命是中国初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1964年原子弹的爆炸和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标志着中国依靠自己不可阻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一群新闻媒体执行人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³⁰⁾

然而，在20世纪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强行军”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漫长过程中，在这样一个国家力量无限地扩张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可怕的、巨大的代价。老子曰：反者道之动。极物必反。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新时期”的到来以及“伤痕文学”的流行反转了20世纪叙事的主要趋势。1978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的发表是“伤痕文学”的一个重要起源。“伤痕文学”实际上逐步发展成为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重写。《伤痕》也成为20世纪对于个人、家、国书写的一个重要转折和新的重写的起点。《伤痕》这篇小说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离家”的故事：主人公王晓华是一个“林道静”式的人物，为了保持革命而与家庭决裂。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小说通过苏小林这个人物对于“革命”发出了强烈追问：“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与1930年代殷夫的“红色抒情诗”阶级的诞生相对照，《伤痕》这篇小说将血缘和“人性”重新置入革命的创伤之中，从而为“新时期”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的隆重登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篇小说也可以视为“告别革命”的一个信号。

1949年以后，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国家的力量在基层农村深入和得到强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新回到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这种经济改革导致农户经济的复兴，同时导致“国家”力量的削弱。因此，19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国家”力量在农村的逐步撤退，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需要出现。这一状况为民间传统“家族”结构力量的自然恢复，提供了前提和空间。这也是1990年代家族叙事和家族想象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

1990年代“新历史小说”尤其是“家族小说”成为对个人、家、国关系的一种重写。在李

30)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406頁，陳景彪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锐的《旧址》中，革命的神话破碎了，革命者被“还原”成为一个家族主义者。银城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革命的女英雄——李紫痕，参加“革命”是由于家族伦理和手足之情：“李乃之没有想到，自己经过七年读书思考才做出的抉择，姐姐竟在一夜之间就做出了。第二天早晨，姐弟俩人在饭桌前坐下来时，李紫痕毅然决然地告诉弟弟：‘弟弟，我也革命。要死我们骨肉死在一起！’”³¹⁾它解构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所建构起来的阶级意识，并且将之还原为家族意识。《白鹿原》里反叛的人物也倒转了五四时代青年“出走”的情节，最终跪倒在祠堂前，“认祖归宗”，皈依于传统家族。“伤痕文学”在对于“革命”与“国家”的解构与“反思”中，“个人”在“家”与“国”之间再一次重新作出了选择，个人、家、国关系发生了重要调整。

《唤醒中国》一书的作者费约翰指出，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标志着现代中国的觉醒。民族的概念是在文学中被发明，并在语言改革运动中被制造出来的。20世纪初，文学和政治建立了深刻的联系。中国现代作家和政治家“都渴望代表/表现一个民族”，“正如西奥多·哈特斯所注意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指示另一个，毋宁说二者都认同一个关于代表/表现的权力的理想，即把想象世界变为现实’。现实主义的概念使它们自动地走到一起，以确保‘两个领域之间一系列的永恒相遇和相互介入’。”³²⁾民族国家成为了中国现代一个最根本的叙述，正是围绕着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大故事，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文学发生了根本的重建。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和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不是简单地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回到文学自身”，而是应该回到文学自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历史现场和历史时刻。

2006年12月修改

31) 李锐《旧址》第14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32) 费约翰《唤醒中国》，第4、20、478页，李恭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参考书目

- 梁漱溟《这个世界會好嗎》，第87頁，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
- 艾愷《最后的儒家》，第29頁，王宗昱、冀建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 老舍《五四給了我什麼》，《老舍文集》第14卷，34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
-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飲冰室文集》之十。
- 孫中山：《三民主義》，見《孫中山選集》，第617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
- 飲冰《論小說与群治之關係》，《中國近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王一川《中國人想象之中國——20世紀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東方叢刊》1997年第1、2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朱自清《論百讀不厭》，《朱自清全集》卷，2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年。

Abstract

Nationalism, State-imagining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uang xin nian

This paper discuss the relation on nationalism, state imagining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ism give a new imagining way and content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that The New China became a important theme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ame time it also determined the content, language and for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 questions about the politic fiction, Bildungsroman, the relation on the dircourse of class and nation.

Key words : nation-State Nationalism Politic-fiction Bildungsroman PHD , Vice-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